

內蒙古出土的元青花高足杯 及相關問題

余佩瑾

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處

提 要

內蒙古與生產元青花瓷器的江西省景德鎮相去甚遠，但是歷年來出土的元青花瓷器，數量不亞於南方省份，此一現象已引起學界關切。這批內蒙古出土的各式元青花中，以高足杯最常見到，明顯地反映出此一器式流行於元朝，並且流通於內蒙古一帶。

本文以內蒙古出土的元青花高足杯作為研究議題，首先舉證相關出土例證，彙整資料之後，發現內蒙古出土的高足杯多數作外侈口、弧形腹的造型，僅有高足出現竹節式、有裝飾和無紋樣的變化。其次，本文也反省了高足杯的式樣、使用脈絡，和傳播途徑所反映出來與西亞交流的可能性。

關鍵詞：元青花、內蒙古、高足杯

前 言

內蒙古位於中國北方，地理位置與生產元青花瓷器的江西省景德鎮相去甚遠。但是歷年來的考古發掘卻顯示該地區出土的元青花瓷器，在數量上有不亞於南方省分的跡象。也因如此，其出土狀況遂日漸受到學者的重視；如岡崎敬、John Carswell 和弓場紀知等均曾針對黑水城的出土狀況，相繼進行分類、分析，並且提出元青花瓷器透過陸路傳銷至境外的可能性。另外，長谷部樂爾和龜井明德也分別針對敖倫蘇木古城與哈刺和林兩地遺址的出土物進行觀察，從中剖析兩地出土元青花的性質。

由於內蒙古出土的各式元青花器形中，以高足杯最為常見，明顯地反映出該一器式流行於元朝，並且流通於內蒙古。故本文擬以出土例證作為切入論述的主題，探討內蒙古出土元青花高足杯的式樣、使用脈絡；及傳銷背景中所反映出來和西亞金屬器交流的可能性。

一、內蒙古出土的元青花高足杯

根據筆者目前掌握到的資料，內蒙古出土元青花的地點計有翁牛特旗墓葬、¹ 通遼市庫倫旗、² 烏蘭浩特市窖藏、赤峰林西、大營子兩處窖藏、多倫縣上都河砧子山村、³ 集寧路古城遺址窖藏、托克托古城遺址、⁴ 燕家梁遺址、敖倫蘇木（也稱「阿倫斯木」）古城遺址、哈刺和林遺址、黑水城遺址等地。這些地區出土的元青花，雖然涵蓋各種器式。但以高足杯最常出現，無形中說明高足杯使用、流通於內蒙古。以下即針對不同的出土地點，分別陳述於後：

（一）烏蘭浩特市郊窖藏：⁵ 此窖藏出土的元「青花龍紋高足杯」（圖 1）在內口沿繪

1 蒙景新，〈翁牛特旗發現元青花玉壺春瓷瓶〉，《文物》，1991年7期，頁59。項春松、賈洪恩，〈內蒙古翁牛特旗梧桐花元代壁畫墓〉，《北方文物》，1992年3期，頁46-48。Adam T. Kessler, *Empires Beyond The Great Wall: The Heritage of Genghis Khan* (Los Angeles: Natural History Museum of Los Angeles County, 1993), 140-141.

2 汪慶正主編，《中國陶瓷全集 11》（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00），圖版 178，頁 162。說明見頁 274。及張柏主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 4》（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圖版 229。

3 張柏主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 4》，圖版 220、221。

4 李逸友，〈托克托城附近的秦漢代遺跡〉，收入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內蒙古文物考古文集》（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4），頁 348-353。和 Adam T. Kessler, *Empires Beyond The Great Wall: The Heritage of Genghis Khan*, 138-139.

5 陸明華，〈元代景德鎮卵白釉瓷燒造及有關問題〉，收入汪慶正主編，《中國陶瓷全集 11》，頁 24。

飾卷草紋一周，杯心畫蟠屈三爪龍紋，外壁裝飾纏枝番蓮，高足外壁另繪倒立蕉葉紋，上下並且加飾一道青線。⁶ 與此件作品一樣，高足外壁同樣裝飾有紋樣者，另有遼寧省博物館收藏的元「青花龍紋高足碗」。該件作品高足上段繪卷草紋，下段繪倒立蕉葉紋，兩種紋飾之間並且間飾青線兩道，圖案上下又各畫一道青線。其他的例證，還有甘肅省武威市涼州區南大街 131 號軍分區出土的元「青花竹節人物紋高足杯」（圖 2）。這件作品高足上段凸出一道圓稜，圓稜之下以青線勾繪三枚倒立的蕉葉紋。⁷ 以及安徽省繁昌縣新港街道窖藏出土的元「青花龍紋高足杯」，於高足中下段繪一圈卷草紋，上下並加飾青線一道。⁸ 與之相似的作品亦見於河北省安新縣出土的元「青花龍紋高足杯」（卷草紋下加飾青線兩道）⁹ 和敖倫蘇木古城遺址的出土標本。¹⁰

- (二) 赤峰林西窖藏：¹¹ 此窖藏出土了三件高足杯，其中一件已殘損至僅剩高足部分。¹² 其餘兩件整器的內口沿皆畫卷草紋，足部作竹節狀（圖 3）。外壁一件裝飾三爪騰龍紋，另一件畫翔鳳紋。無論龍、鳳紋樣，它們身軀的鱗片皆以網格紋表現。相同的作法亦見於內蒙古集寧路窖藏、敖倫蘇木古城、燕家梁、哈刺和林和黑水城遺址。以及河北省新城縣磚廠、安新縣窖藏，江蘇省南京市汪興祖墓、安徽省繁昌縣新港街道窖藏和江西省萍鄉市福田鄉等地的出土品。
- (三) 赤峰大營子窖藏：¹³ 此窖藏共出土五件元青花高足杯，透過已發表的圖版得知其中兩件外壁分別裝飾騰龍和飛鳳，¹⁴ 杯心畫火焰紋，整體風格和林西窖藏、黑水城遺址的出土品相似（圖 4）。
- (四) 集寧路古城遺址窖藏：¹⁵ 此區窖藏共出土六件元青花高足杯。三件外壁畫鳳紋，兩件畫龍紋（一件出土已殘），一件裝飾纏枝菊花紋。其中龍、鳳紋高足

6 圖版見汪慶正主編，《中國陶瓷全集 11》，頁 205。說明見頁 283。

7 張柏主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 16》（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圖版 93。

8 張柏主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 8》，圖版 198。

9 張柏主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 3》，圖版 226。新縣出土的足壁圖案畫得更潦草，卷草紋下加飾青線兩道。

10 卷草紋上下並無加飾青線。圖版見龜井明德編著，《カラコルム遺跡出土陶瓷器調査報告書 II——1948 年ロシア科學アカデミー調査モンゴル國立考古研究所保管資料の調査》（東京：專修大學文學部アジア考古學研究室，2009），頁 67。

11 林西縣文物管理所，〈內蒙古林西縣元代瓷器窖藏〉，《文物》，2001 年 8 期，頁 72-76。

12 該件作品底心畫折枝花卉，高足作竹節狀。

13 唐漢三、李福臣、張松柏，〈內蒙赤峰大營子元代瓷器窖藏〉，《文物》，1984 年 5 期，頁 89-93。

14 *Empires Beyond The Great Wall* 中登錄尺寸為口徑 12 公分，高 10.3 公分。

15 陳永志主編，《內蒙古集寧路古城遺址出土瓷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杯之高足皆作竹節狀，看起來和林西、大營子窖藏相似（圖 5、6、7、8）。

- (五) 燕家梁遺址：¹⁶ 這個遺址出土的高足杯，多數為殘器，從採集發表的瓷片，大概可以分成外壁裝飾龍、鳳紋者及杯心寫「壽」字銘，畫火焰、靈芝、折枝菊花紋和人物圖案等不同的式樣。高足則有光素無紋、竹節狀，和在竹節上又加飾青線者。其中可以復原的元「青花鳳紋壽字高足杯」外壁畫雲鳳紋，杯心寫「壽」字，高足作竹節狀（圖 9），造型與紋飾與赤峰林西、大營子和集寧路窖藏相似。但仔細比較，發現鳳軀羽毛不作網格紋，而是以豎點和勾繪表現翅膀和身軀。相同的畫法、紋樣及造型特徵均和河北省定興縣南關出土的元「青花飛鳳字款高足杯」（圖 10）雷同。¹⁷ 另外，同樣出土自燕家梁遺址，杯心裝飾簡筆折枝菊花紋的高足杯，¹⁸ 則和集寧路古城遺址出土品雷同。
- (六) 哈刺和林遺址：¹⁹ 龜井明德針對此一遺址出土的殘片，從中辨識出一件高足杯殘器（圖 11），該瓷片的裝飾紋樣為有網格紋身軀的龍紋。
- (七) 黑水城遺址：²⁰ 在俄人科滋洛夫採集到的六十件瓷片中，可以發現一件元「青

16 塔拉、張海斌、張紅星主編，《包頭燕家梁遺址發掘報告（上、中、下）》（北京：科學出版社，2010）。及劉幻真，〈包頭市燕家梁出土元代瓷器調查記〉，《內蒙古文物考古》，1981 年創刊號，頁 115-117。

17 圖版見塔拉、張海斌、張紅星主編，《包頭燕家梁遺址發掘報告（下）》，彩版 168；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定興元代窖藏文物〉，《文物》，1986 年 1 期，頁 89-90。

18 圖版見塔拉、張海斌、張紅星主編，《包頭燕家梁遺址發掘報告（下）》，彩版 175。

19 哈刺和林遺址出土品分別收藏於蒙古國立歷史博物館和國立考古研究所兩個機構，見龜井明德編著，《カラコルム遺跡出土陶磁器調査報告書——ロシア科學アカデミー調査／モンゴル國立歷史博物館保管資料の調査》（東京：專修大學文學部アジア考古學研究室，2007）。及龜井明德編著，《カラコルム遺跡出土陶磁器調査報告書 II——1948 年ロシア科學アカデミー調査／モンゴル國立考古研究所保管資料の調査》。

20 John A. Pope 透過瑞典考古學家 Folke Bergman 採集到的六十片青花瓷片，再結合黑水城出土的紙鈔以及相關文獻，判斷黑水城遺址的年代下限當不晚於 1370 年。見 John Alexander Pope, *Chinese Porcelains from the Ardebil Shire*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Freer Gallery of Art, 1956), 72-77 and plate 133. 或 Bo Sommarstrom and Folke Bergme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in The Edsen-gol Region Inner Mongolia* (Stockholm: Statens Etnografiska Museum, 1956), 101-183. 黑水城出土的元青花瓷片，依照岡崎敬、Evgeny Lubo-Lesnichenko、John Carswell、李仲謀、龜井明德和弓場紀知等人的研究，得知主要是小件日用器皿；除高足杯之外，器形還包含碗、盤、罐、執壺、梅瓶、八角瓶和圓口六邊形器等；裝飾紋樣也包含繁複與簡易的兩種類型。相關文章見岡崎敬，〈カラホト古城出土の元青花について〉，收入相賀徹夫編，《世界陶磁全集 13 卷》（東京：小學館，1981），月報，頁 1-3。Evgeny Lubo-Lesnichenko, "The blue-and-white porcelain of Yuan period from Khara-khoto," 收入《中國古代貿易瓷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1994），頁 461-484。John Carswell, "Kharakhoto and Recent Research in Inner Mongolia," *Oriental Art* (1999):1, 19-32. 弓場紀知，〈エルミタージュ美術館所藏のコズコフコレクション——カラ・ホト城出土の中國陶磁器を中心に〉，收入《京都橘女子大學研究紀要》，31 號（2005.1），頁 115-132。及弓場紀知，〈カラホト城は交易都市か——内モンゴル自治區の金・元時代の遺跡出土の中國陶磁器から——〉，收入《オアシス地域史論叢——黑河流域 2000 年の點描》（京都：松香堂，2007），頁 155-156。及李仲謀，〈談黑水城遺址發現的元代青花瓷器〉，收入《中國古陶瓷研究 15 輯》（北京：紫禁城，2009），頁 549-576。另外，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亦收藏有幾片黑水城出土元青花瓷片。

花龍紋高足杯」殘件（圖 12）。該作品器內壁裝飾暗花印紋，杯心畫火焰，外壁繪三爪龍紋，龍軀作網格狀；整體作風與內蒙古大營子窖藏和河北、江西兩地窖藏的出土例極為相似。

（八）敖倫蘇木古城遺址：²¹ 此遺址出土的元青花高足杯，足部裝飾有卷草紋（圖 13）。

綜上所述，內蒙古出土的元青花高足杯，口徑約介於 9 至 12 公分之間，高度介於 9.5 至 10.5 公分之間。同時也存在兩兩窖藏或遺址互為相似，並且普遍和內蒙古以外出土品相呼應的特色。其中集寧路窖藏的出土品，因口徑與圈足著地處較其他出土例證為窄，遂讓整體造形稍顯筆直；然而進一步細究後，發現裝飾其中率性勾繪完成的菊花紋，不僅與同窖藏共伴出土之纏枝菊花紋碗，以及燕家梁遺址出土的高足杯殘件具有相似的作風。更由於纏枝菊花紋碗也見於多倫縣上都河砬子山村、黑水城遺址和江西省高安市窖藏；甚至於江西省九江市出土的元「青花雙耳連座香爐」（又稱之為「青花菊紋鼎式帶座爐」）和上海博物館收藏的元「青花串枝紋菊花紋罐」都看得到相似的紋樣；²² 呈現出一般習見的元青花裝飾風格，故毫無疑問應置於同一脈絡下來考量。

彙整內蒙古的相關出土例證之後，就形制而言，多數杯身作外侈口、弧形腹的造形；但是高足部位則因個別作品而有光素無紋，加飾竹節，以及在竹節上加描青線，甚或畫出卷草紋和倒立蕉葉等相異的變化和處理方式。再就裝飾紋樣而言，以燕家梁遺址出土例最為多樣。整體看來，約可歸納出杯外壁裝飾有龍、鳳和纏枝花卉紋者，和內周壁有、無紋飾，以及使用模印技法呈現雲龍、八寶紋者；杯心又加飾有龍紋、火焰、花卉、人物和葵花，乃至寫有「壽」字銘者。

二、元青花高足杯的造型分類

除了內蒙古之外，元青花高足杯也頻繁地出現於甘肅省武威市涼州區、新疆霍

21 長谷部樂爾，〈オロンスムの陶片——江上波夫氏の採集品——（上）〉，《出光美術館館報》，126 期（2004.2），頁 4-25。長谷部樂爾，〈オロンスムの陶片——江上波夫氏の採集品——（下）〉，《出光美術館館報》，127 期（2004.5），頁 4-38。

22 該香爐因曾被視為共伴出土一件帶至正十一年（1351）銘買地卷，而引起注意。相關作品圖版見張柏主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 4》，圖版 220、221；《中國出土瓷器全集 14》，圖版 129；汪慶正主編，《中國陶瓷全集 11》，頁 126、175、280、260。說明見頁 283。及吳水存，〈江西九江發現元代青花瓷器〉，《文物》，1992 年 6 期，頁 94-95。上海博物館編，《幽藍神采：元代青花瓷器特集》（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2），頁 162-163。

城阿力麻里古城遺址、元大都遺址、²³ 北京西絲胡同居住遺址、河北省定興縣、新城縣、安新縣、江蘇省丹徒縣、江西省上饒市、萍鄉市、高安市、安徽省歙縣、繁昌縣等地窖藏，明顯地反映出高足杯流通於南北地區，若將相關的出土例證一併納入考量，以杯身形制的變化作為分類基準，筆者以為可以簡單地區分成以下三類五個式樣：

（一）第一類高足杯：造形為杯口外侈，杯身作弧形腹的類型。此類作品依照口徑大小而可再細分成 A、B 兩式。A 式為口徑介於 9-12 公分之間者（圖 3）。此式也是整個元青花高足杯中最常見到的器式。如河北省安新縣、新城縣，安徽省繁昌縣，江西省萍鄉市、上饒市、高安市等地窖藏均出土此一器式的高足杯。同時，景德鎮的卵白釉、釉裡紅和龍泉窯青瓷系列作品中也可看得到相同的器式。

B 式為口徑低於 9 公分的組群（圖 2）。此一器式可以甘肅省武威市涼州區出土的元「青花竹節人物高足杯」作為範例。該件作品口徑不到 8 公分，高足上段凸起一道圓稜，呈現出襲仿金屬器的作風。雖然高足加飾凸稜的作法，雷同部分卵白釉瓷的產品（方形足加凸稜，圖 14），但因杯身形制和卵白釉瓷的範例稍有差異，而近似於口徑大於 9 公分的 A 式組群，故將之置於同一類型下來觀察。

（二）第二類高足杯：此一組群杯口微斂，杯身作曲形腹。這類作品依照口徑大小，可從中再分成 A、B 兩式。A 式平均口徑為 12 公分左右（圖 15、16），曲形腹看起來像半球形。相似的出土例見於北京西絲胡同居住遺址、河北省定興縣南關市窖藏、安徽省繁昌縣新港窖藏、江蘇省丹徒縣大路公社窖藏、江西省萍鄉市福田鄉窖藏等處。這些出土品多數足壁皆凸起一道圓稜，有的亦在圓稜上再加飾一道青線。少數也有將高足作成竹節狀者。相同的器式亦見於龍泉窯青瓷和內蒙古出土的絞胎產品（圖 17）。

B 式為斂口特徵更明顯，平均口徑闊達 16 公分以上者。此一器式因口徑較一般元青花高足杯為大，故也有沿用明初命名的概念，將之稱為高足碗。此式可以景德鎮湖田窯窯址的出土標本（圖 18：口徑 17.2 公分）²⁴ 和新疆霍城阿力麻里城遺址出土的元「青花雙鳳高足杯」作為例證（圖 19：口徑 16.1 公分）。該兩件作品口

23 元大都出土的高足杯，見李德金，〈元大都出土青花瓷器的研究〉，《中國古陶瓷研究 6 輯》，頁 228-232。

24 香港大學馮平山博物館，《景德鎮出土陶瓷：景德鎮出土五代至清初瓷展》（香港：馮平山博物館，1992），頁 160。

徑均達 16 公分，口沿呈現出斂口的特徵，高足作竹節狀，竹節上並且加飾青線四道。就個別的裝飾紋樣而言，湖田窯址出土的標本，外壁上段繪一周纏枝菊花紋，下段畫變形蓮瓣內填圖案，上下並且各加飾青線兩道。而阿力麻里城遺址出土的元「青花雙鳳高足杯」，外壁裝飾的紋樣於燒造過程因青料暈開而難以辨識，但仍然浮現出隱約雷同於湖田窯址的紋樣。至於杯心圖案，湖田窯址出土品可能是蓮池鴛鴦紋。²⁵ 而阿力麻里城高足杯的內口沿從依稀可辨識的紋樣，可以判斷出是一周卷草紋和纏枝花卉，杯心則為雙鳳紋。²⁶

（三）第三類高足杯：造形為杯口外敞，杯身斜直如斗笠狀的類型。此組作品可以河北省定興縣窖藏出土的元「青花月影梅紋高足杯」作為範例（圖 20）。²⁷ 雖然該件作品杯壁作斗笠形，但高足仍然形塑出元朝流行的竹節狀。由於斗笠形碗普遍流行於南宋，而易令人產生此式高足杯或產燒較早的聯想，然而若衡量定興窖藏同時伴出第二類 A 式元「青花鳳紋壽銘高足杯」（圖 21），而反映出第二類 A 式和第三類高足杯互為重疊並存的可能性。況且該件元「青花鳳紋高足杯」，無論形制、尺寸、外壁紋樣以及在杯底心寫「壽」字銘的作法，又雷同於內蒙古燕家梁遺址的出土品，足見承襲自南宋風格具斗笠形杯身的高足杯，其產燒時間不一定早於第一類和第二類的作品。

綜上所述，從杯身造型來看，內蒙古出土的元青花高足杯至少存在三類五式的造形變化，這些變化若再結合江西省景德鎮的青白瓷、卵白釉瓷，和浙江省龍泉窯青瓷等，則可再從中細分出如同江西省高安市窖藏所出可以轉動的杯子（圖 22），和同窖藏所出外壁與圈足皆裝飾模印紋樣的類型（圖 23），以及江蘇省揚州市老虎山西路古城遺址所出杯壁作雙層鏤花裝飾者（圖 24），徐州市延祐七年（1320）墓所出杯身更為縱深者（圖 25），西安劉達墓（1337）出土，外壁模印花卉紋的青白瓷高足杯者（圖 26），²⁸ 或山西省霍州窯之高足較矮的類型（圖 27）等不同的器式

25 劉新園、白焜，〈景德鎮湖田窯考察紀要〉，《文物》，1980 年 11 期，頁 39-47。圖見頁 45。

26 此紋樣同時也出現於甘肅臨洮街下鄉寺洼山村雙上社出土的「元青花鸞鳳紋區」，見賈建成，〈介紹幾件甘肅省出土的元青花瓷〉，《考古與文物》，2009 年 4 期，頁 112。

27 張柏主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 3》，圖版 228。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定興元代窖藏文物〉，《文物》，1986 年 1 期，頁 89-91。斗笠式竹節狀高足杯也有卵白釉作品，見張柏主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 6》，圖版 202。相似的作品在安徽省歙縣建築工地和江西省高安市窖藏也有出土。見李輝柄，〈歙縣元代窖藏瓷器的幾點觀感〉，《文物》，1988 年 5 期，頁 89-90、79。歙縣窖藏瓷器見葉涵均、夏躍南、胡承恩，〈歙縣出土兩批窖藏元瓷珍品〉，《文物》，1988 年 5 期，頁 85-88。

28 孫武、楊軍凱，〈元代劉達墓出土的幾件瓷器〉，《收藏界》，2002 年 1 期，頁 22-24。

和裝飾手法。尤其是，前述元青花第一類 A 式高足杯，因也普遍出現於景德鎮卵白釉瓷和龍泉窯青瓷之列，故毫無疑問可視為是元朝流行的器式。同樣地，第一類和第二類高足杯因頻繁地出現於內蒙古出土品之列，而具體地反映出它們從生產到流通於內蒙古的現象。然而最令人深感好奇的是，藉由這些出土例證，我們能否從杯身的造型變化中，找出相應的演變規律呢？

桐山秀穗曾以日本出土的高足杯作為觀察範例，提出口徑與高度比值的分類法。他將出土所見高足杯分成口徑大於高度和口徑小於高度的兩個組群，再從杯足觸地處的外撇程度，分析十四、十五世紀高足杯的先後關係。²⁹ 若以他的分類方式檢驗內蒙古出土的元青花高足杯，則發現多數作品的口徑皆大於高度，但也有少數口徑與高度相同，特別是集寧路窖藏出土的五件元青花高足杯中，三件口徑大於高度，兩件口徑幾乎與高度相等；³⁰ 明顯地反映出口徑與高度的比值存在或大、或小、或相等的關係，而且一個窖藏所出亦有互為重疊的現象，因此不全然能夠如同桐山秀穗所言，可以透過口徑與高度的比值來類推先後的燒製時間。³¹

相對於陶瓷的狀況，借鑑揚之水從金銀器面向的觀察，從她認為金銀器高足杯流行於金元之際，並且有從北方向南方傳播的跡象，以及就出土作品所見，北方製品的高度存在略高於南方的現象。³² 以及與前述第一類元青花高足杯相似的金器也出現在內蒙古興和縣五股泉公社五甲地村 M1 墓，³³ 或烏蘭察布盟也曾徵集到一件荷花紋高足金杯，³⁴ 其式樣也能與北京出土的金代高足杯互為對照，而似乎可以回應陶瓷類高足杯的發展，印證高足杯流行於金元，而且相仿的器型同時並存於陶瓷

29 見桐山秀穗，〈國內出土的馬上杯について〉，收入《高宮廣衛先生古稀紀念論集：琉球・東アジアの人と文化（下卷）》（沖繩：沖繩縣埋藏文化財センター，2000），頁 143-159。

30 其中兩件青花雙鳳紋高足杯之尺寸，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中記錄成口徑 9.4 公分，高 9.5 公分。在《內蒙古集寧路古城遺址出土瓷器》中記錄成口徑 9.4 公分，高 9.4 公分和口徑 9.7 公分，高 9.3 公分。又其中一件在《幽藍神采：元代青花瓷器特集》中，記錄成口徑 9.4 公分，高 9.5 公分，以此看來，集寧路遺址出土元青花高足杯的口徑與高度，因量法不同，而略見差異。無形中反映出同時存在大於、等於和小於三種類型的可能性。

31 接續桐山秀穗之後，余金保亦曾提出元代高足杯的分期研究。他是以馮先銘元朝陶瓷的分期觀作為基礎，再結合出土有紀年銘的高足杯進行論述，但因觀察的例證並未包含任何一件元青花作品，以至於當今學界對於「至正型」元青花燒造時間的討論，完全排除在他建構的三期分類中，使得該類分期觀存在偏離元朝陶瓷生產的全貌，而無法採信。見余金保，〈景德鎮元代高足杯分期研究〉，《陶瓷學報》，33 卷 1 期（2012.3），頁 108-113。

32 揚之水，〈奢華之色——宋元明金銀器研究（卷三）〉（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 57-59。

33 該墓地被視為是汪古部管轄下的集寧路，擁有漢族與汪古部居民。蓋山林，〈興和縣五甲地古墓〉，《內蒙古文物考古》，1984 年 3 期，頁 109-112。

34 張景明、趙愛軍，〈內蒙古地區蒙元時期金銀器〉，《內蒙古文物考古》，1999 年 2 期，頁 51-56、59。

和金屬器之列。然而，由於陶瓷器存在燒造的窯場，特別因元青花高足杯出產自景德鎮，及至傳銷至內蒙古形成普遍流通的現象，明顯地和揚之水透過金銀器表達由北方傳遞至南方的觀點不同。

其次，回歸至本文論述的例證，就器型而言，若考慮到劉逵墓出土的青白瓷高足杯存在的紀年資訊，前述第一類 A 式高足杯或有可能可以看成是一類與之相當，燒製於一三三七年左右的器式。³⁵ 但隨之而來的是，參照劉逵墓而定年的江西省景德鎮紅衛影院的出土品，³⁶ 器型不僅和伊斯蘭銅高足杯相近，同時也和前述第二類 B 式作品具有相同的造型特徵（圖 42）。在此之下，如果紅衛影院的出土例如同報告書所言，可以斷在一三二三年至一三三七年之間，那麼同理可類推第二類 B 式作品亦當與之相差不遠。甚至於與 B 式同屬一個造型組群的 A 式似乎也可以類比在一個相當的區間中。這樣的推想遂讓整組第二類作品似乎可以看成是早於第一類的組群。可是面對當今學界對於元青花紀年作品的瞭解與掌握，則除了器型的觀察之外，似乎也必須考慮裝飾紋樣的狀況，方能界定早晚的問題。

再就紋樣佈局而言，以目前所見各式元青花高足杯為例，能再區分成器內、器外均裝飾有紋樣，和僅在器外畫出紋飾而器內不見紋樣等兩大類，這兩類又可依照紋樣成形的模印和繪畫手法，再細分成更細的項類。無論何種類型，以描繪的角度著眼，這些和內蒙古出土物相關的例證中，存在看似檔次較高者，如烏蘭浩特市郊窖藏和安徽省繁昌縣新港街道窖藏出土的元「青花龍紋高足杯」般（圖 28），杯外壁裝飾的龍紋，是以筆繪方式逐一勾繪出身軀的鱗片，其畫法又和江西省高安市窖藏出土的元「青花雲龍紋纏枝牡丹文獸耳罐」以及明正統六年（1441）朱檀妃子墓出土的元「青花雲龍紋罐」相似（圖 29、30），³⁷ 由於高安市窖藏並無共伴出土明確的紀年資料，近來的研究雖然揭示了該批出土物可能是元朝瑞州路總管府所擁有的祭器，然而對其定年，仍然給予一個一三二一年至一三六七年間的元朝中晚期的區間。³⁸ 另一方面，雖然朱檀妃子墓的年代更晚，若考慮高足杯流行於元朝至明

35 但需留意的是，劉逵墓出土的青白瓷印花高足杯，高足光素無紋，和元青花高足杯帶竹節裝飾者不同。

36 黃薇、黃清華，〈元青花瓷器早期類型的新發現——從實證角度論元青花瓷器的起源〉，《文物》，2012 年 11 期，頁 79-88。又見 Summaries of Lectures by Howard Rogers et al.,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78 (2013-2014): 113-117.

37 高安市窖藏出土龍文獸耳罐的討論，見張瑋恬，〈試論元青花「至正樣式」——以雙獸耳大罐為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頁 119-126、149。

38 劉金成、劉璟邦，〈高安元代窖藏之再研究——窖藏埋藏年代及其主人身份考〉，《南方文物》，2013 年 4 期，頁 101-118。

初，在沒有確鑿的證據必須將兩處窖藏的出土品往下拉之下，本文於此仍然參考高安窖藏的定年，將此類紋樣置於一三二一年至一三六七年之間來考量。

據此，再思考另一類畫法更為講究的龍紋，即鱗片均逐一描繪，並且在每片鱗片中敷染青色，又以留白弧線區隔出相異的鱗片，由於此類畫法同時出現在江蘇省金壇窖藏的元「青花龍紋罐」和大英博物館收藏的元「青花雲龍象耳瓶」。在前者共伴出土一件回曆紀年銘銀盤（1314），後者帶至正十一年（1351）紀年銘之下，提示了此類紋樣出現於一三一四年至一三五一年之間的可能性。與前述單純以線條勾繪的龍紋對照，透過彼此產燒時間互有重疊的跡象，似乎反映出兩類龍紋同時並存的可能性。相對於此，內蒙古出土的元青花高足杯，又展現出勾繪鱗片類型和網格狀類形的龍紋同時並存，一旦回頭檢視勾繪鱗片和講究類型也同時並存的現象，似乎又將三種不同類形的龍紋拉至一個同時並存的水平線上。然而究竟孰先孰後，在現有紀年資料如此窘迫之下，確實無法遽下結論。

相對於龍紋，甘肅武威出土的元「青花人物圖高足杯」，人物臉龐以線描勾勒完成，因下巴處又多出一個勾描的線條，而讓人物臉龐形成仿如具有雙下巴的特徵，此一畫法也出現在英國大英博物館收藏的元「青花人物六棱形蓋盒」上所見人物紋樣。³⁹ 同時，武威出土品仕女臉部眉眼分開，但鼻嘴卻相連成一個暈開的青點，其實和西安張達夫墓出土的元「青花人物圖匣」（1339）具有若干的相似性（圖 31、32、33）；⁴⁰ 加上該件作品器內紋樣的排佈，以人物居中，周繞樹石、花草的構圖，因同時也出現於武威出土品的杯心裝飾，而透露出兩者的燒製時間或隱約相關的可能性。若如是，林梅村以為武威出土的元「青花人物圖高足杯」，其高足上裝飾的蕉葉紋具有「雙勾不填色」的畫法，因與景德鎮落馬橋所見標本相似，讓他從「在蒙元統治階層伊斯蘭文化影響下，元朝浮梁瓷局燒造的元青花從來不繪人物」的角度，將該類產品推定是元末陳友諒割據饒州時，於至元十九年至二十三年（1359-1363）之間訂燒之物的觀點，⁴¹ 面對新出土的紀年資料除了必須重新調整、

39 圖版見上海博物館編，《幽藍神采：元代青花瓷器特集》，頁 96-97。

40 圖版見上海博物館編，《幽藍神采：元代青花瓷器特集》，頁 220-221。出土報告見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西安曲江元代張達夫及其夫人墓發掘簡報〉，《文物》，2013 年 8 期，頁 27-48。除了江蘇省金壇窖藏因共伴出土 1314 年紀年銘銀盤而提示一個較早的紀年資料外，近來張弘略墓出土的元青花瓷盤又出示另一個早期的例證。見河北省文物保護中心、保定市文物管理所、滿城縣文物管理所，〈元代張弘略及夫人墓清理報告〉，《文物春秋》，2013 年 5 期，頁 28-41。

41 林梅村，〈最後的輝煌——落馬橋型元青花〉，《九州學林》（2011 春），頁 82-103。

修正之外；即使再回到高足杯足部裝飾的蕉葉紋，因相似的作法也出現在北京舊鼓樓大街出土的元青花盞托（圖 34），而可視為是普遍流行、流通於元青花作品的裝飾紋樣，因此也不必然將之看成是至元十九年至二十三年之間的紋樣。

由此可知，無論從器形或裝飾紋樣檢視元青花高足杯的燒製時間，截至目前為止，似乎仍然無法從中梳理出一個前後發展的序列關係，但看似多重可能性又無法排除彼此互有重疊的現象，則從另一個面向說明元青花高足杯出產、流行，乃至傳播、發展成多樣造型的經過。

三、高足杯的出現與使用脈絡

關於高足杯的出現，桑山正進以為陶瓷類高足杯最早出現在湖南省長沙市四世紀的東晉墓。該墓出土的青釉高足杯杯口外侈，高足外撇成喇叭形。⁴² 此類喇叭狀高足的造型特色後來也被隋朝所繼承（圖 35），可以長沙黃泥塘隋墓出土的青釉高足杯作為例證，該件作品杯口微外撇，杯身縱長，高足作喇叭狀。⁴³ 不僅和長沙左家塘出土的「褐釉印花高足杯」相似（圖 36），⁴⁴ 同時也和另一個隋墓出土的青銅杯雷同。呈現出陶瓷器高足杯於隋朝即已和金屬器分享共同的器形並且互為襲仿。

再參照齊東方的研究，也得知金屬器高足杯源自中、西亞，該類作品進入中國的時間可上溯至北魏（四世紀末至六世紀前半葉）。齊東方以為北魏時期墓葬所出銅鑲金高足杯，存在高足外壁凸起上下兩道圓稜（被視為有節或竹節）和僅凸起一道圓稜，看起來仍然像是喇叭狀高足的兩個類型。加上具有喇叭狀足的銀高足杯

42 長沙南郊發現的五座東晉墓，其中一座出土一件內外施青釉的高足杯。因考古報告記錄出土自砂墓 3 號，不過對照原報告指稱發現的五座墓，分別是黃泥塘墓 2、3 號，砂子塘墓 2 號、爛泥坑墓 1 號和野坡墓 3 號，因此砂墓 3 號如果不是黃泥塘 3 號墓，就是砂子塘 2 號墓的誤寫。由於砂子塘墓 2 號與黃泥塘墓形制大致相同。加上黃泥塘墓 3 號出土器物多半與「晉寧康三年劉氏女墓」相近或相似。見桑山正進，〈一九六五年來出土的唐代金銀器とその編年〉，《史林》，60 卷 6 號，頁 44-82。考古報告見高至喜，〈長沙南郊的兩晉南朝隋代墓葬〉，《考古》，1965 年 5 期，頁 225-239。國立臺灣大學謝明良教授以為該高足杯為南朝作品。

43 見高至喜，〈長沙南郊的兩晉南朝隋代墓葬〉，頁 229。及高至喜，〈長沙兩晉南朝隨墓發掘報告〉，收入孫海、劉新健主編，《中國考古集成·華南卷》（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冊 25），頁 2118-2160。

44 《中國文物精華大辭典：陶瓷卷》，作隋，《中國出土瓷器全集 13》又以為是唐。本文採納謝明良教授意見，將之視為隋朝產品。國家文物局主編，《中國文物精華大辭典：陶瓷卷》（北京：上海辭書出版社，1995）。張柏主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 13》。

也出土於北魏封和突墓（六世紀初）和內蒙古呼和浩特市（六世紀），⁴⁵ 而且兩地的出土品又和隋李靜訓墓（608年）雷同，遂可從中歸納出具有喇叭狀足的銀高足杯，其鑄造時間可以上溯至六世紀初，並且一路延續至七世紀初，甚至於也和七世紀初隋朝的陶瓷類高足杯類似，反映出陶瓷類高足杯深受西亞或中亞金屬器影響的面向。除此之外，再透過西方一至六世紀出土的高足杯，以及中國出土仿金銀器的銅、錫、陶瓷高足杯的墓葬時間也與中國和拜占廷往來的時間相吻合，讓他回頭呼應桑山正進的研究論點，以為呼和浩特市和李靜訓墓出土的金銀高足杯均來自於羅馬。⁴⁶

相對於器身黏附有高足方稱之為高足杯的器式，出現於湖南省蔣家窯的五代青瓷「高足」自銘器則是另一類完全不同的高足杯。對照考古出土材料，蔣家窯曾出土內底模印「高足盤」（圖37），⁴⁷ 和外底印出「高足碗」三字自銘的青瓷盤（圖38），⁴⁸ 從該些作品實際上並不存在高足，而透露出今日所稱的高足杯在晚唐至五代時期或不稱之為高足杯。依循清人朱琰《陶說》高足碗條下的記載：「周羽沖三楚新錄高從誨時，荊南瓷器皆高足，公私競置用之，謂之高足碗」，⁴⁹ 得以追溯出宋人周羽沖在《三楚新錄》中述及的高從誨（891-948），其實是五代南唐的荊南節度使，他所統御的範圍包括今天湖北江陵、公安一帶。此段記事透過《十國春秋》所述，亦能從：「又荊南尚使甕器皆高其足，公私競製用之，謂之高足碗。……」中，見識到晚唐五代時期荊南人們競逐的高足器，很可能正是蔣家窯出土帶「高足盤」或「高足碗」三字自銘的青瓷盤。從其實際為外撇高圈足中，得以觀察出該類

45 封和突墓出土一件高足銀杯，無節喇叭狀高足出土時已與杯身分離。見馬玉基，〈大同市小站村花圪塔台北魏墓清理簡報〉，《文物》，1983年8期，頁1-4。呼和浩特市出土兩件銀杯，杯形為直口、圓腹，下接喇叭狀高足。而且與之共伴出土的波斯薩珊朝銀幣，一枚從銘文看來當鑄造於六世紀前半葉（499-531）。另外三枚鑄造於六世紀後半葉（531-579），見內蒙古文物工作隊、內蒙古博物館，〈呼和浩特市附近出土的外國金銀幣〉，《考古》，1975年3期，頁182-185。

46 齊東方、張靜，〈唐代金銀器皿與西方文化的關係〉，《考古學報》，1994年2期，頁184-188。施茵在此觀點下，以為靶杯的出現與基督教東傳有關，施茵，〈從元瓷「靶杯」看基督教東傳〉，《南京藝術學院學報》，2011年4月，頁53-56。

47 周世榮、馮玉輝、向開旺、張祖愛、唐先華，〈湖南青瓷與青花古窯址調查報告〉，收入孫海、劉新健主編，《中國考古集成·華南卷》，冊25，頁2015-2035。（原刊登於《湖南考古輯刊2集》）作者將之訂年於晚唐五代。

48 英國 Ashmolean Museum 收藏一件於內底印出「高足盤」的青瓷盤，和一件在外底引有「高足碗」的青瓷盤，從印銘特徵看來，應為蔣家窯的產品。See Mary Tregear, *Catalogue of Chinese Greenware*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76), 66-67, and plate 205.206. 作者將兩件作品定年於唐朝或十世紀。

49 (清)朱琰，《陶說》，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5，頁291-301。

作品其實和具實體高足的器式分屬不同的組群。雖然該類作品自晚唐五代出現以後，即和元朝以來流行的高足杯有別，但從帶外撇高圈足或可視為是追仿金銀器高圈足效果的一種替代作法，而能推它們的出現與流行，亦與崇尚金銀器的風氣有關，並且納入北宋汝窯以及南宋時期一類圈足不高的高足杯（碗）中一起考量。

最後是關於高足杯的使用，劉新園曾引《事林廣記》和《格古要論》的相關記載，提出元朝高足杯有「靶盞」之稱，作為「胡元飲器」或祭器使用。同時因《事林廣記》禮儀類下「拜見新禮」插圖上也畫出高足杯，讓他從圖畫所見說明高足杯應同時有作為酒杯和盛放糕點、水果容器的兩種功能。⁵⁰ 若以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元朝建安椿莊書院刊本（1328-1332）《事林廣記》為例，重新檢視劉新園的說法，⁵¹ 因「把官負盞」下，有「一人持酒瓶居左，一人持果盤居右」的說明，同時對照版畫插圖（圖 39），也可以看到桌上擺置的高足杯明顯地放置有果品，至於人物手持托盤上的高足杯，因存在看似果物的四個圓圈，而讓人無法冒然援引《事林廣記》中的圖像，說明高足杯作為酒杯使用。

儘管如此，江西省高安市窖藏出土，杯心寫有「人生百年長在醉，算來三萬六千場」兩句詩的元青花高足杯，反而藉由字義清楚地呈現作為酒杯使用的可能性。此點似乎也能連結前述甘肅武威出土，杯心畫有馬上彈琵琶仕女的高足杯（圖 2），透過該圖像似能傳達小說戲曲中「昭君出塞」的意象，進一步連結燕家梁遺址出土，杯心裝飾有人物畫的例證；反映出裝飾人物紋樣的高足杯件數不多，卻流通於北方。同時該器出土於甘肅省武威市涼洲區，易令人產生和唐人王翰〈涼州詞〉中：「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的聯想，似乎也從另一個面向展現出高足杯和「馬上杯」可能相關。根據青木正兒的考證，王翰筆下的「夜光杯」應指傳自西域的玻璃杯，⁵² 不過從高安窖藏出土或可作為酒器的例證中，間接說明了高足杯亦能和唐宋詩人筆下的馬上杯相互對照，反映出類似的使用狀況。

如唐朝詩人白居易〈留題天竺靈隱兩寺〉詩中，即有「漸出松間路，猶飛馬上杯」，金人李俊民〈和籌堂送別韻〉詩中，也出現「山城望斷首重回，猶勸春風馬上杯」。或如宋人彭汝礪的「桃花笑摘籬邊菊，竹葉慚無馬上杯」等意象的描述，呈

50 劉新園；高美喜譯，〈永樂前期官窯の白磁研究：永樂・宣德官窯考證その一〉，《東洋陶磁》，1985年15-16卷，頁165-166。

51（宋）陳元靚，《事林廣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52 見青木正兒，〈酒觴趣談〉，收入《中華名物考（外一種）》，（北京：中華書籍出版社，2005），頁92-95。

現「馬上杯」作為酒器，使用於告別送行的場合。以此看來，一些杯心寫有「福」或「壽」字銘的元青花高足杯，其使用與背後富含的寓意或也如同寫出「春壽」銘的梅瓶一樣，具有祝福遠行者福壽綿延的深意。這樣的推想似乎也能和十四世紀伊朗的產製品互為呼應。例如一些在口沿上刻填銘文的錫銅鑲嵌（含有高錫成分）高足杯，透過文字表述而出對於美好飲料的渴望，或者直接裝飾持杯暢飲的人物圖像，無不反映出伊斯蘭習俗中將高足杯當作飲器或調酒器的使用方式，前文論及的景德鎮紅衛影院的出土品，即是與之對照，反映出與伊斯蘭交流的一個例證。⁵³

四、陸路傳銷途徑及與西亞交流的可能性

由於內蒙古出土元青花的地點，無論是赤峰、集寧路、燕家梁、敖倫蘇木古城和黑水城等，皆位於傳輸往來必經的交通幹道上。故讓岡崎敬、John Carswell 和弓場紀知等人以為元青花瓷器的傳銷，除了水路運輸之外，還存在陸路傳銷的可能性。⁵⁴ 特別是近來弓場紀知針對黑水城和集寧路兩地遺址出土物的觀察，又進一步提出元青花瓷器先聚集於元大都，然後再輾轉經由陸路傳銷至內蒙古各地。⁵⁵ 本文同意陸路傳播的觀點，以下同樣思及透過內蒙古出土的元青花瓷器及其和南方出土品的關係，連結蒙元時期為「通達邊情，布宣號令」而設置的驛道，⁵⁶ 思考元青花經由陸路傳銷，甚至藉由工藝本身傳達出來的西亞風格，思考經由陸路傳輸至西亞的可能性。

就交通網絡而言，根據李逸友研究，草原上的絲綢之路可分成東半段與西半段兩條路。所謂東半段是指以嶺北行中書省哈刺和林作為基準點，一路暢行至大都的驛道。此一段路又可再細分成帖里幹道、木憐道和納憐道等三條路。而從哈刺和

53 Kachel Ward, *Islamic Metalwork* (New York: Thames and Hudson Inc., 1993). 及 Linda Komaroff and Stefano Carboni, *The Legacy of Genghis Khan: Courty Art and Culture in Western Asia, 1256-1353*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002), 209-210. 黃薇、黃清華從景德鎮紅衛影院窯址所出元青花高足杯口下波斯文詩句，認為該類作品是為波斯貴族調製美酒而燒造。見黃薇、黃清華，〈元青花瓷器早期類型的新發現——從實證角度論元青花瓷器的起源〉，頁 85。

54 岡崎敬，〈カラホト古城出土の元青花について〉，頁 1-3。John Carswell, “Kharakhoto and Recent Research in Inner Mongolia,” 19-32.

55 弓場紀知，〈エルミタージュ美術館所藏のコズコフコレクション——カラ・ホト城出土の中國陶磁器を中心に〉，頁 115-132。及弓場紀知，〈カラホト城は交易都市か——内モンゴル自治區の金・元時代の遺跡出土の中國陶磁器から——〉，頁 155-156。

56 陳高華，〈論元代的站戶〉，收入元史研究會編，〈元史論叢二輯〉（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 125-143。

林往西到察合臺汗國，再一路穿過西亞到達東歐的道路，即為西半段絲綢之路。⁵⁷ 以此交通路線來看內蒙古出土元青花的地點，可以連結出以下四個面向：

其一，集寧路古城遺址位於內蒙古自治區集寧市東南三十公里的察右前旗巴音塔拉公社土城子村，元時在金朝（建於金章宗明昌三年，1192）的基址上持續擴建，考古發掘曾在古城遺址中發現一塊「集寧文宣王廟學碑」（被視為刻題於皇慶元年（1312）），以及反體墨書「集寧路達魯花赤總管府」字樣的提花綾，而說明該地區於十四世紀上半葉作為行政機構的經過。⁵⁸ 尤其是該遺址窖藏同時出土質地結構和南方福州南宋墓所見完全雷同的素羅，足見該古城與南方貿易往來的可能性。⁵⁹ 以此對照《元史》中有關「集寧路下領縣一集寧」的記載，也能推知集寧路古城遺址應有驛道和內蒙古及南方城鎮連接、相通。⁶⁰

其二，就燕家梁遺址而言，該地位於包頭市九原區麻池鎮，元時屬於中書省大同路轄地，近雲內州和東勝州。無論是否如同遺址發掘者所言，該地較有可能屬於雲內州境內，但從其有納憐道的大同路經過，該遺址與內蒙古其他城市確有道路相通。特別是元至元四年（1267）於應理州（寧夏中衛縣）沿黃河而下至東勝州，增設十個水驛站，其中和東勝州相接的一個水驛站即為梧桐花鄉。該地墓葬曾出土一件元「青花龍紋玉壺春瓶」，造型與裝飾風格和安徽省蕪湖縣的出土品極為類似。⁶¹ 同時，如前所述燕家梁遺址出土的元青花高足杯也見於河北省定興窖藏，而反映出該地與內蒙古地區及南方相通的史實。加上元成宗元貞元年（1295），弘吉刺部亦曾在翁牛特旗烏丹振興建全寧城，規劃一條全寧路，可接赤峰再達上都，那麼同樣歸屬於弘吉刺領地的赤峰大營子窖藏，其地所出元青花亦可置於同一交通網絡下理解。

其三，作為納憐道起站的東勝州，往東轉豐州後可接大同路到大都和上都，西經甘州、亦集乃路可至哈刺和林。其附近的托克托古城遺址出土一件口徑超過四十公分的「元青花菱花式折沿盤」，⁶² 該盤盤面裝飾藍地白花紋樣，盤心畫蓮池鴛鴦，

57 李逸友，〈元代草原絲綢之路上的紙幣——內蒙古額〉，《中國錢幣》，1991年3期，頁16-23、7。

58 潘行榮，〈元集寧路故城出土的窖藏絲織物及其他〉，《文物》，1979年8期，頁32-35。

59 陳永志主編，〈內蒙古集寧路古城遺址出土瓷器〉，頁23。

60 陸明華，〈對元集寧路窖藏出土瓷器的初步認識〉，《中國古陶瓷研究11輯》，頁53-70。

61 只是蕪湖縣出土品的尺寸稍小一點翁牛特旗高28，蕪湖縣高為24.5。見安徽省博物館編，《元瓷之珍》（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頁55。

62 李逸友，〈托克托城附近的秦漢代遺跡〉，頁348-353。

外繞六個如意雲頭形開光，每個開光內再飾以海水蓮花、海水鴛鴦、海水鷺鷥和海水祥鹿等不同的組合。裝飾風格不僅和 Ardebil Shire 和 Topkapi Sarayi 所見藏品相似，⁶³ 同時因也能對照哈刺和林和黑水城所見標本，雖然數量極為零星，卻也無法從中排除元青花瓷器透過驛道一路往西傳銷的可能性。尤其是該盤外底與外周壁所存在的三十餘枚銅釘修補痕，顯示出該一瓷盤被充分使用與修補的經過，⁶⁴ 此一現象又非常巧合地能和哈刺和林出土已經穿好釘孔待修的許多瓷片對照，間接反映出銅釘修補技術流通於內蒙古的情形。

其四，作為汪古部最重要的經濟、文化和政治中心的敖倫蘇木古城，有德寧路經過，是豐州通往哈刺和林必經之道，⁶⁵ 而位於大都路附近的多倫縣上都河的砧子山村也出土兩件「元青花折枝菊花紋碗」，該兩件作品的尺寸、形制與紋樣和內蒙古集寧路古城遺址、黑水城遺址和江西省高安市窖藏出土品相近。同樣印證元青花瓷器經由南方經過大都再繼續北上，除了流通於內蒙古各地之外，至少往西也到達了黑水城。

根據《元史》記載，至元二十三年（1286）元廷於黑水城設置亦集乃路總管府，從此以後，黑水城成為亦集乃路的行政中心。歷年來的考古清理也發現該地出土寫有「皇帝聖旨亦集乃路總管府」和「皇帝聖旨亦集乃路總管」的文書，以及殘留地表猶可追溯而出的總管府官衙遺跡，除了一併印證史書對該地活動的記載之外，⁶⁶ 對於黑水城往東可達起站東勝州，往西轉北可到哈刺和林，再往東接通往上都和大都的大同路幹道，再向西接甘州和肅州的驛站一路可到達察合台汗國的首府阿力麻里城，也因為作為納憐道上的一個大接駁站證據的出現，而提供了四通八達路線的可能性。無論馬可波羅（1254-1324）東來是否曾經過黑水城前往上都謁

63 Medley 以為折沿大盤的形制應源自於伊斯蘭金屬器，盤徑多數介於 38 至 46 公分之間，產燒時間可置於 1325 至 1350 之間。見 Margaret Medley, *The Chinese Potter: A Practical History of Chinese Ceramics* (London: Phaidon, 1976), 178-182.

64 龜井明德教授通過散落於哈刺和林遺址中觸目所見經過銅釘修補的瓷器，以及已經預先穿孔但尚未進行修補的瓷片，提出該地所見陶瓷器被充分使用情形；除此之外，內蒙古各地出土帶銅釘修補痕的作品，也反映出銅釘修補術流傳於十四世紀前半葉內蒙古的情形。

65 王曉華，〈江上波夫考察阿倫斯木古城隨記〉，《內蒙古文物考古》，1992 年 7 期，頁 130-132。及鄧宏偉、張文芳，〈阿倫斯木谷城遺址〉，《內蒙古文物考古》，1992 年 1 期，頁 133-138。

66 陳炳應，〈黑城出土的一批元代文書〉，《考古與文物》，1983 年 1 期，頁 55-62。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阿拉善盟文物工作站，〈內蒙古黑城考古發掘紀要〉，《文物》，1987 年 7 期，頁 1-23。及李逸友，〈黑城文書所見的元代納憐道站赤〉，《文物》，1987 年 7 期，頁 36-40。

見元世祖忽必烈。文獻記載由「由肅州到甘州」，從甘州騎行十二日，⁶⁷ 抵達亦集乃後，再行四十日可達哈刺和林的路線，亦足以和近世以來發現的考古遺跡相呼應。

從驛站連接的路線觀察哈刺和林與黑水城兩地出土的元青花高足杯，發現兩者同樣皆以龍紋為飾，而且龍身鱗片亦作網格狀，透露出一種風格經由陸路傳銷的可能性。相同的例證同樣反映在新疆霍城阿力麻里城遺址，該遺址出土的元「青花雙鳳高足杯」，器形因與景德鎮湖田窯出土標本雷同，而清楚的展現產地來源。不僅如此，與此件元青花高足杯共伴出土的嵌銀銅高足碗（圖 40），也明顯地傳達了同一個遺址出土的銅與瓷，共同分享一類相似的器形。再通過阿力麻里城遺址出土的嵌銀銅高足碗其實和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兩件伊斯蘭銅回文高足碗（圖 41：口徑約 18.1 公分，高 13.7 公分）⁶⁸ 具有相似的尺寸及造形特徵，加上內底心也存在一個圓圈形的製作痕，口沿下刻寫著一圈由古體阿拉伯文拼寫而成的文字等，無不透露出銅高足碗來自西亞；⁶⁹ 據此遂能反推阿力麻里城遺址出土的元青花高足杯，其器形具有西亞金屬器的風格。

具有西亞金屬器風格的元青花高足杯，近來在景德鎮紅衛影院窯址第六地層也有發現，該地共出土十四件元青花高足杯（口徑約 17 公分，高 13.5 公分），其中 7 件口下寫有波斯文詩句（圖 42），透露出元青花高足杯或曾為西亞市場生產的可能性。⁷⁰ 那麼這一系列帶有西亞裝飾風格的作品，是否可以和新疆霍城阿力麻里城出土物連結，說明它們通過不間斷的驛站和交織而成的交通網路，一路往西傳播，則有待未來更多的資料加以證實。

結語

截至目前為止，雖然未有清晰、明確的資料足以證實元青花瓷器透過陸路

67 亦有作十六日，馬可波羅至上都可參考石堅軍，〈馬可波羅上都之旅考述〉，《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7 卷 1 輯（2012.1），頁 141-151。

68 張臨生，〈故宮博物院收藏的伊斯蘭銅器〉，《故宮文物月刊》，102 期（1991.8），頁 4-15。及石守謙、葛婉章主編，《大汗的世紀：蒙元時代的多元文化與藝術》（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1），頁 324。

69 新疆博物館，〈新疆伊犁地區霍城縣出土的元青花瓷等文物〉，《文物》，1979 年 8 期，頁 26-31。

70 黃薇、黃清華，〈元青花瓷器早期類型的新發現——從實證角度論元青花瓷器的起源〉，頁 79-88。

傳銷至西亞的推測，但是從弓場紀知收集到的資料顯示，在烏茲別克撒馬爾罕（Samarkand Uzbekistan）的歷史博物館中，也存在一件元青花八角瓶殘件，同時，該館出版的圖錄亦曾刊登過一件元青花纏枝番蓮紋碗的殘件。由於兩件作品都是當地出土，明顯地反映出元青花瓷器傳銷至撒馬爾罕的情形。⁷¹ 如果從驛道運輸的可能性來思考，八角瓶的器形也見於黑水城遺址和河北省保定窖藏。而看起來像纏枝番蓮紋碗的作品，同樣也出土於北京舊鼓樓大街、內蒙古燕家梁遺址和甘肅武威市等曾作為重要轉運站之處。加上阿力麻里城附近亦出土和北京舊鼓樓大街相似的元「青花鳳首扁壺」，⁷² 這些例證說明景德鎮產燒的元青花瓷器，經由四通八達的交通路線傳銷至內蒙古各地，甚至經過黑水城，一路往西抵達察合台汗國，或更遠的地方。

其次就相關出土例的作品風格而言，阿力麻里城出土的元「青花雙鳳高足杯」因和共伴出土的伊斯蘭銅碗造型相似，而反映出該類器形和伊斯蘭金屬器密切相關。同時該件作品也和伊朗國家博物館收藏，尺寸較大的元「青地白花孔雀牡丹紋碗」（圖 43：口徑 37.5 公分，高 8.2 公分）造型相似，而能作為同一思維下的例證，說明此類元青花瓷器深受西亞市場歡迎的可能性。此點亦如英國 Ashmolean Museum 收藏的另一類元「青花纏枝蓮花鴛鴦紋高足碗」（圖 44：口徑 18 公分，高 17.8 公分），杯口呈現出更為內斂的造型特徵，不僅器形明顯地可以對比至十三世紀的波斯陶器和十四世紀的錫銅鑲嵌高足碗，再度展現出元青花高足杯（碗）中所存在和伊斯蘭風格密切相關的作品。即使至明朝永樂、宣德時期，透過景德鎮珠山窯址出土的帶蓋青花瓷和白瓷豆形器（圖 45、圖 46），仍然傳達出高足杯類器背後隱含的中西交流面向，亦一路延燒至十五世紀上半葉。


71 弓場紀知，〈サマルカンドの花嫁——ウズベキスタンに中國の染付をもとめて——〉，《陶說》，717 號（2012.12），頁 51-59。

72 張柏主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 16》，圖版 185。

附錄一 內蒙古及相關窖藏或遺址出土元青花高足杯統計表

圖版編號	出土地點	出土高足杯樣式	高足杯尺寸	文獻出處	備註
圖 1	烏蘭浩特市郊窖藏		口徑 10.4 公分， 高 9.5 公分	陸明華，〈元代景德鎮卵白釉瓷燒造及有關問題〉，收入汪慶正主編，《中國陶瓷全集 11》（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00），頁 24。 又見龜井明德，〈中國出土の元青花瓷資料集成〉，收入《亞州古陶瓷研究》2（2005），頁 1。	註 5
圖 2	甘肅武威出土		口徑 7.7 公分， 高 8.9 公分	張柏主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 16》（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圖版 93。	註 7
圖 3	赤峰林西窖藏		口徑 11.4 公分， 高 9.6 公分	林西縣文物管理所，〈內蒙古林西縣元代瓷器窖藏〉，《文物》，2001 年 8 期，頁 72-76。 又見龜井明德，〈中國出土の元青花瓷資料集成〉，收入《亞州古陶瓷研究》2（2005），頁 1-3。	註 11
圖 4	赤峰大營子窖藏		龍(左)：口徑 12.2 公分，高 10.6 公分 飛鳳(右)：口徑 11.4 公分，高 9.7 公分	唐漢三、李福臣、張松柏，〈內蒙赤峰大營子元代瓷器窖藏〉，《文物》，1984 年 5 期，頁 89-93。又見龜井明德，〈中國出土の元青花瓷資料集成〉，收入《亞州古陶瓷研究》2（2005），頁 4-5。	註 13
圖 5、 6、7、 8	集寧路古城遺址窖藏		圖 5：口徑 9.5 公分，高 9.5 公分 圖 6：口徑 9.4 公分，高 9.5 公分 圖 7：口徑 9.4 公分，高 9.5 公分 圖 8：口徑 9.5 公分，高 9.4 公分	陳永志主編，《內蒙古集寧路古城遺址出土瓷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又見龜井明德，〈中國出土の元青花瓷資料集成〉，收入《亞州古陶瓷研究》2（2005），頁 6-13。	註 15

圖版編號	出土地點	出土高足杯樣式	高足杯尺寸	文獻出處	備註
圖 9	燕家梁遺址		口徑 11.9 公分， 高 9.4 公分	塔拉、張海斌、張紅星主編， 《包頭燕家梁遺址發掘報告 (上、中、下)》(北京：科 學出版社，2010)。及劉幻真， 〈包頭市燕家梁出土元代瓷器 調查記〉，《內蒙古文物考 古》，1981 年創刊號，頁 115- 117。	註 16
圖 10	河北省定興縣出土		口徑 11.7 公分， 高 9.4 公分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定興 元代窖藏文物〉，《文物》， 1986 年 1 期，頁 89-90。 又見龜井明德，〈中國出土の 元青花瓷資料集成〉，《亞州 古陶瓷研究》2 (2005)，頁 22-24。	註 17
圖 11	哈刺和林遺址		殘片	龜井明德編，《カラコルム遺跡出土陶瓷器調查報告書——ロシア科學アカデミー調査／モンゴル國立歷史博物館保管資料の調査》(東京：專修大學文學部アジア考古學研究室，2007)。龜井明德編著，《カラコルム遺跡出土陶瓷器調查報告書 II——1948 年ロシア科學アカデミー調査／モンゴル國立考古研究所保管資料の調査》。	註 19
圖 12	黑水城遺址		殘件	John Alexander Pope, <i>Chinese Porcelains from the Ardebil Shire</i>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Freer Gallery of Art, 1956), 72-77 and plate 133. 或 Bo Sommarstrom and Folke Bergmen, <i>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in The Edsen-gol Region Inner Mongolia</i> (Stockholm: Statens Etnografiska Museum, 1956), 101-183. 又見龜井明德，〈中國出土の元青花瓷資料集成〉，收入《亞州古陶瓷研究》2 (2005)，頁 14-16。	註 20

圖版 編號	出土地點	出土高足杯樣式	高足杯尺寸	文獻出處	備註
圖 13	敖倫蘇木 古城遺址		殘件	<p>長谷部樂爾，〈オロンスムの陶片——江上波夫氏の採集品——（上）〉，《出光美術館館報》，126期（2004.2），頁4-25。長谷部樂爾，〈オロンスムの陶片——江上波夫氏の採集品——（下）〉，《出光美術館館報》，127期（2004.5），頁4-38。又見龜井明德，〈中國出土の元青花瓷資料集成〉，收入《亞州古陶瓷研究》2（2005），頁13-14。</p>	註 21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宋)陳元靚,《事林廣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清)朱琰,《陶說》,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二、近代論著

- 上海博物館編,《幽藍神采:元代青花瓷器特集》,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2。
 內蒙古文物工作隊、內蒙古博物館,〈呼和浩特市附近出土的外國金銀幣〉,《考古》,1975年3期,頁182-185。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阿拉善盟文物工作站,〈內蒙古黑城考古發掘紀要〉,《文物》,1987年7期,頁1-23。
 王曉華,〈江上波夫考察阿倫斯木古城隨記〉,《內蒙古文物考古》,1992年7期,頁130-132。
 石守謙、葛婉章主編,《大汗的世紀:蒙元時代的多元文化與藝術》,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1。
 石堅軍,〈馬可波羅上都之旅考述〉,《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7卷1輯,2012年1月,頁141-151。
 安徽省博物館編,《元盜之珍》,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西安曲江元代張達夫及其夫人墓發掘簡報〉,《文物》,2013年8期,頁27-48。
 余金保,〈景德鎮元代高足杯分期研究〉,《陶瓷學報》,33卷1期,2012年3月,頁108-113。
 吳水存,〈江西九江發現元代青花瓷器〉,《文物》,1992年6期,頁94-95。
 李仲謀,〈談黑水城遺址發現的元代青花瓷器〉,收入《中國古陶瓷研究15輯》,北京:紫禁城,2009,頁549-576。
 李逸友,〈元代草原絲綢之路上的紙幣——內蒙古額〉,《中國錢幣》,1991年3期,頁16-23、7。
 李逸友,〈托克托城附近的秦漢代遺跡〉,收入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內蒙古文物考古文集》,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4,頁348-353。
 李逸友,〈黑城文書所見的元代納伶道站赤〉,《文物》,1987年7期,頁36-40。
 李德金,〈元大都出土青花瓷器的研究〉,《中國古陶瓷研究6輯》,頁228-232。
 李輝柄,〈歙縣元代窖藏瓷器的幾點觀感〉,《文物》,1988年5期,頁89-90、79。
 汪慶正主編,《中國陶瓷全集》,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00,冊11。
 周世榮、馮玉輝、向開旺、張祖愛、唐先華,〈湖南青瓷與青花古窯址調查報告〉,收入孫海、劉新健主編,《中國考古集成·華南卷》,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冊25,頁2015-2035。

- 林西縣文物管理所，〈內蒙古林西縣元代瓷器窖藏〉，《文物》，2001年8期，頁72-76。
- 林梅村，〈最後的輝煌——落馬橋型元青花〉，《九州學林》，2011年春季，頁82-103。
- 河北省文物保護中心、保定市文物管理所、滿城縣文物管理所，〈元代張弘略及夫人墓清理報告〉，《文物春秋》，2013年5期，頁28-41。
-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定興元代窖藏文物〉，《文物》，1986年1期，頁89-91。
- 青木正兒，〈酒觴趣談〉，收入《中華名物考（外一種）》，北京：中華書籍出版社，2005，頁92-95。
- 施茜，〈從元瓷「靶杯」看基督教東傳〉，《南京藝術學院學報》，2011年4月，頁53-56。
- 香港大學馮平山博物館，〈景德鎮出土陶瓷：景德鎮出土五代至清出窯展〉，香港：馮平山博物館，1992。
- 唐漢三、李福臣、張松柏，〈內蒙赤峰大營子元代瓷器窖藏〉，《文物》，1984年5期，頁89-93。
- 孫武、楊軍凱，〈元代劉達墓出土的幾件瓷器〉，《收藏界》，2002年1期，頁22-24。
- 馬玉基，〈大同市小站村花圪塔台北魏墓清理簡報〉，《文物》，1983年8期，頁1-4。
- 高至喜，〈長沙兩晉南朝隨墓發掘報告〉，收入孫海、劉新健主編，《中國考古集成·華南卷》，頁2118-2160。
- 高至喜，〈長沙南郊的兩晉南朝隋代墓葬〉，《考古》，1965年5期，頁225-239。
- 國家文物局主編，《中國文物精華大辭典：陶瓷卷》，北京：上海辭書出版社，1995。
- 張柏主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冊3、4、6、8、13、14、16。
- 張景明、趙愛軍，〈內蒙古地區蒙元時期金銀器〉，《內蒙古文物考古》，1999年2期，頁51-56、59。
- 張瑋恬，〈試論元青花「至正樣式」——以雙獸耳大罐為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
- 張臨生，〈故宮博物院收藏的伊斯蘭銅器〉，《故宮文物月刊》，102期，1991年8月，頁4-15。
- 陳永志主編，《內蒙古集寧路古城遺址出土瓷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 陳炳應，〈黑城出土的一批元代文書〉，《考古與文物》，1983年1期，頁55-62。
- 陳高華，〈論元代的站戶〉，收入元史研究會編，《元史論叢二輯》，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125-143。
- 陸明華，〈元代景德鎮卵白釉瓷燒造及有關問題〉，收入汪慶正主編，《中國陶瓷全集》，冊11，頁24。
- 陸明華，〈對元集寧路窖藏出土瓷器的初步認識〉，《中國古陶瓷研究11輯》，頁53-70。
- 揚之水，〈奢華之色——宋元明金銀器研究（卷三）〉，北京：中華書局，2011。
- 項春松、賈洪恩，〈內蒙古翁牛特旗梧桐花元代壁畫墓〉，《北方文物》，1992年3期，頁46-48。
- 黃薇、黃清華，〈元青花瓷器早期類型的新發現——從實證角度論元青花瓷器的起源〉，《文

- 物》，2012年11期，頁79-88。
- 塔拉、張海斌、張紅星主編，《包頭燕家梁遺址發掘報告（上、中、下）》，北京：科學出版社，2010。
- 新疆博物館，〈新疆伊犁地區霍城縣出土的元青花瓷等文物〉，《文物》，1979年8期，頁26-31。
- 葉涵均、夏躍南、胡承恩，〈歙縣出土兩批窖藏元瓷珍品〉，《文物》，1988年5期，頁85-88。
- 賈建威，〈介紹幾件甘肅省出土的元青花瓷〉，《考古與文物》，2009年4期，頁112。
- 蒙景新，〈翁牛特旗發現元青花玉壺春瓷瓶〉，《文物》，1991年7期，頁59。
- 蓋山林，〈興和縣五甲地古墓〉，《內蒙古文物考古》，1984年3期，頁109-112。
- 齊東方、張靜，〈唐代金銀器皿與西方文化的關係〉，《考古學報》，1994年2期，頁184-188。
- 劉幻真，〈包頭市燕家梁出土元代瓷器調查記〉，《內蒙古文物考古》，1981年創刊號，頁115-117。
- 劉金成、劉璟邦，〈高安元代窖藏之再研究——窖藏埋藏年代及其主人身份考〉，《南方文物》，2013年4期，頁101-118。
- 劉新園、白焜，〈景德鎮湖田窯考察紀要〉，《文物》，1980年11期，頁39-47。
- 潘行榮，〈元集寧路故城出土的窖藏絲織物及其他〉，《文物》，1979年8期，頁32-35。
- 鄧宏偉、張文芳，〈阿倫斯木谷城遺址〉，《內蒙古文物考古》，1992年1期，頁133-138。
- 岡崎敬，〈カラホト古城出土の元青花について〉，收入相賀徹夫編，《世界陶磁全集13卷》，東京：小學館，1981，月報，頁1-3。
- 弓場紀知，〈エルミターージュ美術館所藏のコゾコフコレクション——カラ・ホト城出土の中國陶磁器を中心に〉，收入《京都橘女子大學研究紀要》，31號，2005年1月，頁115-132。
- 弓場紀知，〈カラホト城は交易都市か——内モンゴル自治區の金・元時代の遺跡出土の中國陶磁器から——〉，收入《オアシス地域史論叢——黑河流域2000年の點描》，京都：松香堂，2007，頁155-156。
- 弓場紀知，〈サマルカンドの花嫁——ウズベキスタンに中國の染付をもとめて——〉，《陶說》，717號，2012年12月，頁51-59。
- 桐山秀穗，〈國內出土の馬上杯について〉，收入《高宮廣衛先生古稀紀念論集：琉球・東アジアの人と文化（下卷）》，沖繩：沖繩縣埋藏文化財センター，2000，頁143-159。
- 桑山正進，〈一九六五年來出土の唐代金銀器とその編年〉，《史林》，60卷6號，頁44-82。
- 長谷部樂爾，〈オロンスムの陶片——江上波夫氏の採集品——（上）〉，《出光美術館館報》，126期，2004年2月，頁4-25。
- 長谷部樂爾，〈オロンスムの陶片——江上波夫氏の採集品——（下）〉，《出光美術館館報》，127期，2004年5月，頁4-38。
- 劉新園；高美喜譯，〈永樂前期官窯の白磁研究：永樂・宣德官窯考證その一〉，《東洋陶

磁》, 1985年15-16卷, 頁165-166。

龜井明德編著, 《カラコルム遺跡出土陶瓷器調査報告書——ロシア科學アカデミー調査／モンゴル國立歷史博物館保管資料の調査》, 東京: 專修大學文學部アジア考古學研究室, 2007。

龜井明德編著, 《カラコルム遺跡出土陶瓷器調査報告書 II——1948年ロシア科學アカデミー調査／モンゴル國立考古研究所保管資料の調査》, 東京: 專修大學文學部アジア考古學研究室, 2009。

Carswell, John. "Kharakhoto and Recent Research in Inner Mongolia." *Oriental Art* (1999):1, 19-32.

Kessler, Adam T.. *Empires Beyond The Great Wall: The Heritage of Genghis Khan*. Los Angeles: Natural History Museum of Los Angeles County, 1993.

Komaroff, Linda and Stefano Carboni. *The Legacy of Genghis Khan: Courtly Art and Culture in Western Asia, 1256-1353*.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002.

Lubo-Lesnichenko, Evgency. "The blue-and -white porcelain of Yuan period from Khara-khoto." 收入《中國古代貿易瓷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臺北: 國立歷史博物館, 1994, 頁461-484。

Medley, Margaret. *The Chinese Potter: A Practical History of Chinese Ceramics*. London: Phaidon, 1976.

Pope, John Alexander. *Chinese Porcelains from the Ardebil Shire*.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Freer Gallery of Art, 1956.

Rogers, Howard et al..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78 (2013-2014): 113-117.

Sommarstrom, Bo and Folke Bergme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in The Edsen-gol Region Inner Mongolia*. Stockholm: Statens Etnografiska Museum, 1956.

Tregear, Mary. *Catalogue of Chinese Greenware*.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76.

Ward, Kachel. *Islamic Metalwork*. New York: Thames and Hudson Inc., 1993.

Underglaze-Blue Stem Cups of the Yuan Dynasty Excavated in Inner Mongolia and Related Issues

Yu, Pei-chin

National Palace Museum, Department of Antiquities

Abstract

Inner Mongolia and Jingdezhen in Jiangxi Province, where underglaze-blue porcelains were fired in the Yuan dynasty, are separated by considerable distance.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the numbers of underglaze-blue porcelains discovered in Inner Mongolia compare favorably with those found in southern areas, a fact that has come to the attention of scholars. In this group of various underglaze-blue porcelains from the Yuan dynasty, the most commonly seen type is the stem cup. It clearly indicates that this vessel type was popular in the Yuan dynasty and circulated as far away as Inner Mongolia.

This study addresses several topics of research on Yuan underglaze-blue stem cups excavated in Inner Mongolia. After enumerating their identity in the excavations and organizing the relevant examples, it has been discovered that most of the stem cups in Inner Mongolia feature flaring mouths and curved bodies with only variations in terms of the appearance of stems: with bamboo-joint, decorated, and undecorated. The study then examines the function of these stem cups and their types as well as their means of transmission to reflect on the possibility of exchange with West Asia.

Keywords: Yuan underglaze-blue, Inner Mongolia, stem cup

(Translated by Donald E. Brix)



圖 1 元 青花龍紋高足杯 烏蘭浩特市郊窖藏出土



圖 2 元 青花竹節人物紋高足杯 甘肅武威出土



圖 3 元 青花龍紋、鳳紋高足杯 赤峰林西窖藏出土



圖 4 元 青花龍紋、鳳紋高足杯 大營子窖藏出土



圖 5 元 青花雲龍紋高足杯 集寧路窖藏出土



圖 6 元 青花雙鳳紋高足杯 集寧路窖藏出土



圖 7 元 青花雙鳳紋高足杯 集寧路窖藏出土



圖 8 元 青花纏枝菊紋高足杯 集寧路窖藏出土



圖 9 元 青花鳳紋壽字高足杯 燕家梁古城遺址出土



圖 10 元 青花飛鳳壽字款高足杯 河北省定興縣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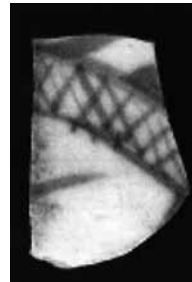


圖 11 元 青花雙龍紋高足杯殘片 哈刺和林出土



圖 12 元 青花雙龍紋高足杯殘片 黑水城出土



圖 13 元 青花高足杯殘片 教倫蘇木古城出土



圖 14 元 卵白釉高足杯 上海博物館藏



圖 15 飛鳳「福」字銘高足杯 江西萍鄉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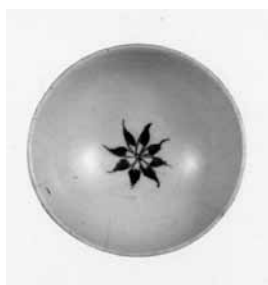


圖 16 元 青花松竹紋高足杯 江蘇丹徒窖藏出土



圖 17 元 絞胎高足杯 集寧路窖藏出土



圖 18 元 青花纏枝花卉高足杯 湖田窯北岸出土



圖 19 元 青花雙鳳高足杯 新疆霍城出土



圖 20 元 青花月影梅紋高足杯 河北定興窖藏出土



圖 21 元 青花鳳紋「壽」銘高足杯 河北定興窖藏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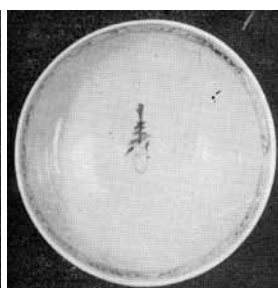


圖 22 元 釉裡紅高足轉杯 江西高安窖藏出土



圖 23 元 青白釉印花高足杯 江西高安窖藏出土



圖 24 元 卵白釉鏤花高足杯 江蘇揚州出土



圖 25 元 卵白釉高足杯 江蘇徐州出土



圖 26 青白瓷高足杯 西安劉遠墓出土



圖 27 元 白釉高足碗 集寧路窖藏出土



圖 28 明元 青花龍紋高足杯 安徽繁昌窖藏出土



圖 29 元 青花雲龍牡丹紋獸耳蓋罐 江西高安窖藏出土



圖 30 明 青花雲龍紋罐 朱檀妃子墓出土



圖 31 元 青花昭君出塞圖高足杯 甘肅武威窖藏出土



圖 32 元 青花人物蓋
盒大英博物館藏



圖 33 元 青花人物
圖匣 陝西安
張達夫墓出土



圖 34 元 青花纏枝花卉紋
盞、盞托 北京舊鼓
樓大街窖藏出土



圖 35 南朝青釉高足杯
湖南長沙墓葬出土



圖 36 隋 褐釉印花高足杯
湖南長沙墓葬出土



圖 37 五代青瓷盤 湖南蔣家窯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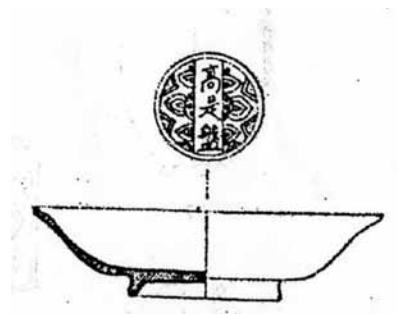


圖 38 五代青瓷盤 Ashmolean Museum
collection



圖 39 元 建安椿莊書院刊本
(1328-1332)《事林廣記》
插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40 伊斯蘭嵌銀銅高足杯
新疆霍城出土



圖 41 伊斯蘭銅回文高足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42 元 青花纏枝花卉紋高
足碗 景德鎮紅衛影院
窯址出土



圖 43 元 青地白花孔雀牡丹紋碗 伊朗國
家博物館藏



圖 44 元 青花纏枝花卉高足碗
Ashmolean Museum collection



圖 45 明 宣德青花萱草紋帶蓋豆
景德鎮珠山遺址出土



圖 46 明 永樂帶蓋白瓷豆 景德鎮珠
山遺址出土